

戴 翊 [著]

面对躁动的

都市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戴 翊 [著]

面对躁

丹晨老师

教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市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躁动的都市 / 戴 翊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当代作家作品选,第6辑 / 吉狄马加,黄济人主编)

ISBN 7-5059-4271-9

I. 面... II. 戴... III. 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H1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971 号

书 名	戴翊·面对躁动的都市
主 编	吉狄马加 黄济人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阮增宝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45 千字
印 张	10.75 印张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271-9/I·3332
定 价	199.00 元(本册定价 18.00 元)

拒绝浮躁

——序戴翊《面对躁动的都市》

曹惠民

在学术被频频亵渎的当下，以严肃敬畏之心善待学术的戴翊，是值得敬重的，——在我收到他寄来的厚厚一叠文稿时，我不禁默默地这样想。当他来电要我为他这本名为《面对躁动的都市》的论文集写序时，我似乎看到了这位“面对躁动的都市”而拒绝浮躁的学者伏案笔耕的身影。他的拒绝浮躁不自今日始。

结识戴翊兄，是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七十年代末。作为华东师大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与戴翊、王小明诸兄一起师从于许杰、钱谷融二位先生。戴翊涉足文学批评、文学研究，还是在文革尚未结束、偏居于江西乡村学校的时候。攻读研究生的时代，我们都已不再年轻，那时的校园是宁静的，我们只知道一心向学、别无旁骛。还记得，很多个日子，戴翊常常是清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悄悄地溜出门走到夏雨岛、丽娃河边读外语。他的刻苦、努力，在同学中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毕业以后，他供职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我则执教于苏州大学。20多年来，彼此互通音问，交往一直不断。我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对他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操守感到钦佩与欣慰。

《面对躁动的都市》是戴翊的第四本著作。屈指算来，从1982年研究生毕业正式开始文学研究，这四本书，花费了戴翊生命中最宝贵的20年光阴，这在如今动辄年出一两本书（甚至更多）的那些“学者”、“批评家”看来，近乎“无啥稀奇”了。可我不这么看。我不想把戴翊与那些日产万字、年产一书（或数书）的“捷才”相比。戴翊撰文著书，每有所作，都以极严肃极认真的态度出之。不存哗众取宠之心，也不刻意去经营什么“理论体系”、“宏观架构”，他总是实实在在地评论一部部作品，研读一个个作家，以此发表一点点自己的看法，不作石破天惊之语，实有精研细解之心。

《面对躁动的都市》是又一个佐证。

这部论文集共收论文54篇，几乎都写于近四、五年间，而我知道，这几年正是戴翊兄身体欠佳之时。很难想象，这些文章都是他以病弱之身，在跑医院的间隙中写成的。他的勤勉与坚毅在这里显示，他的见识与操守在这里闪光。这些论文，有三个明显的特色：一是上海情结。从对上海文化风格的命名到上海城市文化的建设、上海文学与城市精神的探讨，从《大上海小说丛书》到上海舞台、荧屏上的话剧、京剧、电视剧，从《大上海漂浮》到《汽车城》，戴翊始终关注着上海，很多上海作家都是他的评论对象。他的学术生命是与上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是当代意识。戴翊的文学评论紧紧追随着上海作家前进的步伐，他的视野与上海文学界的脉动休戚相关，凡是他关注的作家一有新作问世，作为评论家的戴翊就会很快

作出反应，真所谓是“感应的神经”，异常鲜明的当代意识正是戴翊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的重要素质。三是审美眼光。戴翊的文学批评，绝非浮谈无根、空无依傍的漫不经心之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作品是“老老实实在地”“反复阅读体味”，“不打印象分”，认真“捕捉自己的感觉”（《文学的发现》后记），故总能谈出一些独到的见解来。比如他对“海派”命名的思考，他对“另类写作”与西方存在主义关系的追问，他对话剧“荒诞”魅力的探寻，他对上海小说表现出“诗情的守望”的判断等等，都发人之所未发，彰显了戴翊独到而精警的审美眼光，无疑也表现出他学养的深厚与批评功底的扎实。

也许戴翊的批评业绩称不上美仑美奂，也许他的文学观念在某类人看来未免保守，也许他的见解并不为所有人赞同，但是，在批评界高蹈空泛之论充斥、追捧炒作之风盛行的当下，戴翊以他的默默劳作，以他的“拒绝”和“坚守”，表现出他敬畏学术、敬畏生命的精神气质。他无愧于“批评家”和“学者”这样崇高的称谓。

我为有这样的朋友与同道感到骄傲，并以为这是中国学术界之幸。

目 录

拒绝浮躁

——序戴翊《面对躁动的都市》	曹惠民 (1)
不用“海派”，如何?	(1)
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文学	(4)
世纪之交的上海文艺	(26)
论改革开放与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	(37)
文学创作与城市精神	(51)
现实主义精神的当代理论构建	(58)
现实主义精神与文学创作	(63)
现实之共振	
——现实主义精神与近年反腐题材创作	(68)
移植与“原型”的发掘	
——从动画片《花木兰》谈起	(73)
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论	(76)
关于文学现象的谈话三篇	(80)
(一) 关于先锋文学与通俗文学	

(二) 是文学行为还是商业行为?

(三) 传记作品的生命在于真实

读《大上海小说丛书》第一辑 (90)

都市的躁动与诗情的守望

——读《大上海小说丛书》第二辑 (97)

铺展都市的当下生活

——读《大上海小说丛书》第3辑《九九年的玫瑰》 (103)

与时代同步的文学

——评长篇小说《大上海漂浮》 (109)

无法回避的选择

——读王火《月落乌啼霜满天》 (112)

《狐坟》的文学价值 (115)

艺术家眼中的人类脚步和命运

——读长篇小说《长相思》 (118)

揭示生命的体验和误区

——写于《海派女作家文丛》出版之际 (120)

“另类写作”展示的是什么? (123)

透过那耀眼的辉煌

——读蒋丽萍的长篇新作《水月》 (127)

升华了的苦难记忆

——读长篇小说《暗香浮动》 (130)

历史小说创作的关键

——评长篇历史小说《赛金花·凡尘》 (133)

中国人的“轿车梦”

——读长篇小说《汽车城》 (140)

深爱与无奈

——读中篇小说《耶稣圣光》 (147)

直面历史

——读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弥天》 (151)

读长篇小说《省委书记》 (157)

儿童文学创作应有的艺术品位

——读《名家自选文学丛书》 (160)

俊逸明丽，深沉隽永

——萧丁散文琐议 (162)

从女性世界走进更为深广的时代生活

——王小鹰论 (166)

在现实和时代潮流中求索的作家

——俞天白论 (192)

小说中的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

——读李伦新的《上海爱情》 (208)

成熟中的上海青年作家 (214)

陆星儿创作道路简论 (217)

竹林创作道路简论 (222)

孙颙创作道路简论 (228)

艺术家的真情和勇气

——电视连续剧《一号机密》观后 (233)

现代都市生活的悲剧内涵

——话剧《去年冬天》观后 (236)

话剧的现实主义深化

——话剧《办公室秘闻》观后 (240)

“荒诞”的魅力

——话剧《谁是赢家》观后 (244)

渗透着历史真实的艺术画卷

——看电视连续剧《银楼》 (247)

从历史精神中汲取滋养

- 历史剧《贞观盛事》观后 (251)

意义的淡化及其他

- 也谈电视剧《突出重围》与《光荣之旅》 (255)

为着那无价的尊严

- 看话剧《尊严》 (259)

戏剧创作如何直面现实 (263)

如何理解心理现实主义伦理剧《艺术》 (269)

电影与觉醒了的社会意识 (274)

林湄小说创作的现实意义 (277)

新视角、新主题和新的艺术形象

- 读黄运基的长篇小说《异乡曲》第一部《奔流》 (289)

实实在在的人生韵味

- 读程乃珊的《双城之恋》 (300)

鲁迅小说研究的一块铺路石

- 读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 (304)

开拓现代文学研究的绿洲 (312)

叶中强《寻找家园》序 (316)

许豪炯《五卅时期文学史论》 (320)

金沙与篝灯

- 读欧阳文彬的《文苑梦忆》 (323)

时代呼唤“报告” (325)

贵在相知 (329)

后 记 (331)

的都市上海的“海派文化”——“海上画派”、戏剧等，是相对于传统文化极地北京的传统的“礼俗文化”的性质不同的文化。

现代意义的“海派文学”产生于20年代末期以后的上海。吴福辉曾经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其“海派”性质：1. 它应当最多地“转运”外来的文化。2. 它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3. 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4. 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代表作家则是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苏青等人^①。而与之相对的“京派文学”则产生于1927年以后。当时大革命失败，国都南迁，但有一批作家，如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废名、林徽因、曹禺、肖乾等留在了北平，相安于北方，写他们的梦幻，发他们的议论，他们就政治立场而言大多属于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们借着相对平稳的文学空气，避开政治斗争漩涡，致力探寻文学的内部规律，不拘一格地追求艺术的完美，这就是“京派”作家群。“京派”作家群与“海派”作家群在政治见解、文学见解乃至一般的行为方式都不同。可见，“海派”与“京派”的对立，有其经济形式、政治生活的不同背景，以及政治、文学见解的不同。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精神以政策形式推到了所有文学家的面前，真实意义上的海派文学同京派文学一样，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京派”主张过的“第三条道路”被彻底唾弃，而“海派”随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崛起，特别在《文汇报》等报刊对

^① 参见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

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尖锐批评中，也最终被清算得一干二净。既然如此，今天在全国大一统的经济形式和政治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文化艺术的性质渐趋划一，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海派”已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其二，“海派”并不是一个好的字眼。由于清末产生于西风渐进的上海的艺术，其风格及价值追求与传统艺术显著不同，所以被竭力维护“正统”的北方艺人蔑称为“海派”。到1934年，“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更是给“海派”堆上许多恶名，如“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冒充风雅”、“吃吃喝喝”、“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或偷采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等等，等等。上述劣迹或许有个别人为之，但用其涵盖整个“海派”作家，也是很不少的。

其三，“海派”作家在当年本来就只是上海地区作家中的一个流派，并不是整个上海地区作家的代称，况且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也并不独独于上海一隅，“海派”作家不能等同于上海地区的作家，而我们今天讲的“海派文化”、“海派文艺”恰恰是指的整个上海地区的文化和文艺。

所以我主张取消“海派文化”、“海派文艺”的提法，改称为“上海文化”和“上海文艺”。“海派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是应该研究的，但对现在的上海文化和上海文艺，还是不冠之以“海派”为好。

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文学

上海这一地区本来就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及以后在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都发生在这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与作品，几乎都从上海出发走向全国。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原有的基础上，由于一批解放区作家的先后抵沪和不少新作家的成长，上海作家队伍得以充实壮大，文学创作也是有成绩的。但在“文革”的10年间，上海的文学事业遭受巨大的摧残和污染。上海作协被停止活动，大批作家被打击和迫害。上海原有的文学刊物全部停刊，创作园地一片荒芜。这一时期出现的少量“作品”，基本上都是根据“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按照“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的创作模式胡编瞎造的，谈不到起码的真实感和艺术性。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春风，使文学回到了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摆脱了“文革”期间毁灭文学的“瞒”和“骗”，恢复和弘扬现实主义的传统，上海的文学创作重新振兴，并且日趋繁荣。许多老作家重新执笔，青年作家也成批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文学创作，是上海的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人生的体验和探究的产物。它展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意念、情绪和欲求，启迪读者沉浸于艺术感染之中时认识人生，思索人生的价值和真谛，从而显示自觉的参与意识，并且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往前、往深求索。同时，上海许多作家积极投入生活，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汲取创作的题材和灵感，努力与时代同步。这是上海的文学创作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基本体现。

一 在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思索中体现文学对人生的关注

许多作者以一定社会历史的内涵为基点观照人生，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重心问题进行艺术的生发。有的表现为对历史的深沉反思，把历史与人生的深沉反思熔为一体，以深刻清醒的人生观念去观照历史中的遭际、失落、灾难和不幸，表达对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以及由此造成的弊端的抨击，表达历史和时代的情绪；有的揭示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有的则体现人们在新时代感受到的困扰。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作家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生体味联系着人民的情感，因此人们能够在深切的艺术感受中引起思索与共鸣。

在小说创作上，最早触及50年代后期那场灾难的作品之一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通过在“大跃进”的声浪中谎报产量、不顾群众死活的干部步步升官，而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为百姓请命的干部反而被扣上“右倾”帽子、撤职处分的故事，从干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这个根本态度上启迪人们进行深刻反思。

如果说长篇小说《氛围》（俞天白）是通过1957年反右扩大化期间一群大学生在人生的急转弯中陷入到无比痛苦的精神地狱的过程，反思了那场巨大的政治风暴，那么短篇小说

《天桥》(李晓)则把较长历史时期中的政治风云和极左路线给成千上万的普通人造成的几十年的悲剧命运,凝缩到主人公的人生道路中。《叔叔阿姨大舅和我》(李晓)中的叶阿姨的历史本来谈不到有什么“问题”,就因为深知这个“历史污点”一旦被揭露的可怕后果,才不得不自杀,悲剧的发生竟然取决于这个完全不成为“问题”的所谓“污点”。沈嘉禄把自传体的中篇小说命题为《冠礼》,显示了其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在1968年,14岁的“我”被诬陷写过一条反动标语,从此“我”失去了如同阳光、空气般重要的尊严、自由和前途,受尽了屈辱和批斗,失去了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于是1980年平反后例行的毫无表情的握手,就成了“我”的“冠礼”。殷慧芬的中篇小说《早晨的陷阱》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时代人们几乎全都卷入了非理性的迷狂这一本质特征。而主人公由一个有理想、抱负、热情和才干的青年沉沦为玩世不恭、赌博酗酒的“痞子”,也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另一部长篇小说《贼船》(彭瑞高)则以生命意识去观照作为历史的知青人生。小说中三个知青的人生是生命和环境的冲突,他们有正当的生命需求,但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氛围之中,非但被剥夺了合理实现的权利,甚至生命存在的权利也会被剥夺,而他们自身的弱点又使其人生遭遇更为复杂和曲折。

对复杂的现实人生的展示,标明作者们的人生感受渗透到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把普通人的人生引进创作领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突破。上海的作家在平凡的生活中开掘新的人生价值,寻求新的人生意蕴,在普通人的人生体验中寄寓自己对特定时期重大社会问题的思索。

沈善增的小说有一种内在的悲剧感。他善于把普通人的人

生作为艺术支点，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人生的深层、内在的痛苦，在其人生况味中揭示发人深思的社会现象。《她在半空中》，围绕女主人公的遭际，对工厂各个层面人物的情绪、愿望和心理逻辑，都作了丝缕毕现的梳理，讽刺了那种大轰大嗡、粗疏浮泛的工作作风，而且人们对这种风习也习以为常，不觉其荒谬。《走出狭弄》把那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省悟到孤独的“落后分子”虽有个“冷冰冰的硬壳”，内心却渴望着温暖这一点比作“走出狭弄”，也是使人回味的。

王小鹰的中篇《一路风尘》和李晓的短篇《继续操练》揭露教育界的不正之风，前者是暗写，通过矢志不渝报效祖国的青年学者的情怀，来反衬同行的妒贤嫉能、不能容人的阴暗心理；后者是明言，围绕着研究生论文被剽窃事件的各种表演，尖利地活画出某些学者教授在派系倾轧中纵横捭阖、狗苟蝇营的嘴脸。

中国女性的人生，她们的真实处境和奋争，是现当代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曾经涌现过不少作品。传统的伦理规范使得中国女性在历史上承受了比男性更多的苦难。对女性命运和心理的关注和表现，是王小鹰多年来的创作母题，把着力表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态和命运，表现她们为实现自身价值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努力，启迪人们对充斥生活中耗尽女性生命力的传统观念和习俗作批判性的自省。《新嫁娘的镜子》中的女主人公霞娣在出嫁前被告诫说：到了夫家“不要学得女人不象女人样”，从这句简单的训诫中可以感受到中国女性在伦理规范上仍然受到的压迫。《星河》着力表现女主人公在婆母压迫下，被繁重的家务弄得心力交瘁，无法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严酷现状。《春无踪迹》揭示了当代一些女性自身的弱点。而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则更深刻地揭示普通中国女性在生

活中的实际处境。小说中的“唐淑女离婚案”和“范宝鼎、言凤娇遗产诉讼案”中的两个女性当事人唐淑女和沈惠婷在家庭中是根本不被当作一个“人”的。为什么唐淑女忍受了十多年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的痛苦，没人同情她，而当她终于提出离婚时，工厂干部和居委会马上纷至沓来，百般阻挠？为什么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真相的范宝鼎、言凤娇遗产案，竟能够被一个律师弄得扑朔迷离，而身为知识分子的受害者沈惠婷竟会被各方面的压力逼上绝路？除了司法工作中的弊病以外，难道不正是人们不把妇女当“人”的传统伦理观和深层心理，仍然在冠冕堂皇的口实下压迫妇女吗？

陆星儿的视线主要是对准在各个岗位上的知识女性，经济上既已独立，更有文化这个精神上的支撑。也许作者认为把这个层次的妇女作为表现的对象能够更有说服力地表现中国妇女的现实处境。《女律师的故事》通过女律师伍玉辉的惨淡人生揭示不健康的社会文化心态给妇女带来的苦难。这位从11岁就离开国民党军官家庭参加人民军队，去过朝鲜战场，在司法界卓有成绩的女律师，就因为追求真实的生活和正当的爱，不愿同上级强令“结合”的男人厮混一辈子，并且又在工作中敢于坚持原则，而长期被歧视、遭迫害。要不是她身体里那股扑不灭的生命之火和人生的信念，她真是早就要被吞噬了！《一个和一个》是探讨女性人生意义的作品。女工程师华菁也许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人生的标本。把在事业上和个人生活中都非常出色，有着知识女性的成熟和自信力。她怀着爱，保持着女性的魅力，工作有所创造，不带任何做作地乐观地生活，不但在事业上实现了人生价值，在个人生活和情感上也没有虚掷光阴。这是理性的追求和爱的力量带来的色泽鲜亮的人生。